



李白

他
詩
刻

李 白

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長安，生於西域，後徙居蜀中。天寶初，入京，供奉翰林，因諍言被疏，後流夜郎，卒於當塗。

言其志氣，有詩曰：『君不見長安城，天子祠黃帝。』

故其詩，多言及，永王孫，傳感東南，進致之，及歸，

敗，白坐繫獄，流夜郎，以赦得釋。

代崇以左長卿召，而白曰：『卒。』年六十四。

蜀道難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

叢開國何茫然。爾來萬八千，

與金。西當太白有鳥道，可

嵎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鋤

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

盤盤，百步九折聲巖巖。扪參歷井仰脅息，以

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

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

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

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砅崖轉石萬壑雷。

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

峰巒峭拔，一夫當關，萬夫莫前。所

胥樹人著

丁巳仲夏

李白和他的诗歌

胥树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白和他的诗歌

胥树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环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字数 214,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9,500

统一书号: 10186·460 定价(七): 1.05元

不见李生久
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
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
头白好归来

——杜 甫

目 录

第一章	李白的时代和家世·····	1
第二章	漫游生活的开始·····	41
第三章	青春和欢乐之歌·····	73
第四章	北上东鲁和三入长安·····	103
第五章	情感的升华·····	151
第六章	情感的表现·····	191
第七章	晚年：今日之日多烦忧·····	227

第一章 李白的时代和家世

李白生地之谜——前无古人——均田制的危机——地主集团的分裂与中、小地主——训诂和骈俪同时衰落——社会交际的发展及其对诗文的影响——复古运动——诗歌中的新风：汉魏风骨——李白与其当代文学——李白“本家金陵”解——“指天枝以复姓”——李白的性格与环境——早年的教养——赵蕤和李白：黄老之学——谒见苏颋——最早的诗——中国封建社会划时期的变化——玄宗封禅和唐诗分期——清真与华丽——《登峨眉山》与《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情感的差异与真实性——早发白帝城

（李白，在中国被称为“诗仙”。）不仅他的诗歌有时描写到仙人、经常说到神仙；而且他的风格也变幻莫测、常常表现出冲破尘世的一切而高升到一个更高的世界的倾向。即使他的生平，也被种种传说所包围，笼罩着层层采色缤纷的迷雾。甚至他刚一下生，就有一个神秘的传说。（说是他母亲生他时，梦见太白星落在她的怀里；所以他名白字太白）。

他的生地也是个谜。许多纪载都只说他五岁时随他的父亲来到广汉（这是汉朝的地名，唐朝叫巴西郡。他住的青莲乡原属四川彰明，今并入江油县），对他的生地说得不大清楚。郭老根据文献中有“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的说法，认为他生于碎叶，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的托克马克附

近。但文献中明明说的是他的先世，并未说他本人生于碎叶。隋末到武后末年他降生的时候已经一百多年。那时隋朝早已灭亡，而且他的先代总在“流离散落”，怎么能断定还在碎叶呢？

“隐易姓名”这句话也有疑问。他先世被窜，是得罪了隋朝。唐朝已经建立了一百多年，还有什么必要要“隐易姓名”呢？

而且据文献纪载，这“流离散落，隐易姓名”好象是说他父亲的事。这和“隋末”更接不上了。

正因为这种矛盾，所以陈寅恪便在1935年宣称以上这一切“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而断定他是“西域胡人”。郭沫若反驳了陈先生以他为胡人之说，而同意他“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只不过将新疆的碎叶考证为苏联的碎叶而已。

郭沫若的考证，对于了解李白的先世和隋唐的版图无疑有其贡献；但对于解决李白生地的问题，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现在我们尝试从另一方面来探索一下。

刘全白写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一开始就说：“君名白，广汉人。”碣作于贞元六年（790年）。当时李白逝世还不到三十年，而且他自己说：“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他的儿子伯禽贞元八年才死，而且就在当地（安徽当涂，李白墓在此）。说不定刘全白这篇文章就是他请他写的；至少他也可能参与其事。魏颢在《李翰林集序》里也说：“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这篇序里关于李白生平的叙述，都出自李白口授；至今它还是研究李白生平最权威的资料。他们所说，我以为都是可信的。这个问题，且留到下面再说。现在还讲讲太白星。

秋季傍晚西方天边上最早升起的那颗最亮的星就是太白星，又叫做金星。《西游记》里太白金星就是它。它是神的使者。它又叫做长庚星。在古代它也叫做商星。据现代的天文学家说，

它也就是每天早上最后隐没的那颗最亮的星，一般称为启明星，古代叫做参星。当时天文知识不发达，不知道它们原是同一颗星，就说它们是兄弟二人，因为不和而日寻干戈。所以上帝^①把他俩一个变做参星，一个变做商星。它们永远互相追逐，但总是不能见面，所以口语里把彼此不能见面称为“参商”。如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兄弟不和也叫“参商”。李白的诗，人们说是“集复古之大成”^②，同时又和他以前的诗很不相同，启示了后来一种新的作风。在这个意义上，他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倒真有点象那颗太白星。他的影响，虽然在后来的古、近体诗（即中国人狭义地所谓“诗”）里不如杜甫的，但是在广义的诗歌（如词、曲等韵文）里却有着巨大的影响。苏、辛词不用说；例如在关汉卿和马致远的曲文里，我们就明显地可以看到。

这种新的作风是什么样的作风呢？一般往往把它概括为浪漫主义风格。但目前对于浪漫主义的界说，也是说法纷纭的。而且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名词来概括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一切文学作品是否行得通，笔者实在怀疑，所以本书不采用这种说法。

大家都觉得李白的诗“热情奔放”。本来抒情诗是我国诗歌中最发达的部门；中国很早的诗歌理论就认为诗是“发乎情”的。但儒家的诗歌理论又要求诗要“止乎礼义”。还在这种说教之前，屈原的作品虽然充满了怨愤，他却有意抑制自己，处处表现自己的忠心。其后阮籍的《咏怀》诗，虽然着重抒情，也有意使之隐晦。陶潜比较乐观，也谈不到奔放。即使曹操的诗，慷慨激昂，也不能说是奔放。所以同是抒情，在奔放这一点说，他确是前无古人。

那么他的这一特点从何而来呢？是不是如传统评论家所说，只是由于他的天才或是个性呢？

个性是环境的产物。要理解李白的个性，首先要明白他所处的环境。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李白所处的时代，这里请允许我稍为扯得远一点！

一般论李白所处的时代，往往笼统地说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代。实际上每个兴盛或者衰落的时代都各有其特点。说明这些特点，不能仅靠现象罗列。

有的同志具体一点。他们说到均田制。他们把唐朝经济的繁荣归之于均田制，而把李白诗歌中的乐观主义归于这种经济的繁荣（有时还加上武功），甚至把唐诗的繁荣也跟这种经济的繁荣联系起来。

的确，李白生活的大部份时期，社会经济是相当繁荣的。但这种繁荣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李白或李白的诗联系起来的呢？

的确，李白曾经写过：

河堤绕绿水，桑柘连青云。
赵女不冶容，提笼昼成群。
缲丝明机杼，百里声相闻。
讼息鸟下堦，高卧披道帙。
蒲鞭挂檐枝，示耻无扑扶。
琴清月当户，人寂风入室。
长啸无一言，陶然上皇逸。③

这里面确实对均田制有些理想化。但在李白诗中，这不过是正在消逝的过去时代的余响而已。而且李白自己也知道：这个过去并不象他在这里所写的那样“闲逸”。在他的诗集里这首诗有着浓厚的应酬味道。他并不能够反映出李白的思想核心。

真正能够使李白不朽的还是他对未来的那些展望，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

自倒非人摧。”“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惟愿高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等等。使他看到未来的希望的，正是均田制的内部以及均田制的旁边日渐发展起来的私人经济(包括一些中小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

从表面看来均田制度似乎是保障农民有耕地。实际上它限制的只是小农私自开垦田地和“民间”对土地的自由买卖。封建贵族照样可以利用封建特权得到赏赐的土地。他们可以把田地连同庄宅、奴婢一起赠送，甚至可以直接抢夺。在开始的时候，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皇朝正处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过程中，它(均田制)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隋朝把它推行到全国，进步意义就有限了。不错，运河的开凿正基于均田制度。它对沟通南北经济的确起了一定进步作用。但这是它的客观作用。如果在一个更进步的政权领导之下，运河同样可以开凿，而且相信效果一定好得多。从民间传说的《开河记》看来，运河的开凿充满了劳动人民血泪斑斑的故事。历史唯物主义对评价历史人物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他对人民的态度；一个是他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两个标准可以统一，也可以不统一。农民起义有时实行一些破坏生产力的政策，无害于它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力量。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有时为了剥削、压迫的目的也可能对发展生产力做一点好事，但决不能改变他的反动本质。

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因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④。”在另一处他又说：在阶级社会中，“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⑤。”在这里他当然不是说“统治阶级的利益”有什么“进步作用”。如果因为隋炀帝开了运河而称他为伟大的或杰出的政治家，那将是绝顶的荒唐。

不但开运河，隋末对高丽的战争以及唐朝前期那些大规模的战争（其中有些是正义的，如早期对突厥的战争；但有一些是非正义的）也都是依靠均田制度这个经济基础进行的。它虽然保证了皇朝土地上的劳动力，便于征收赋税，便于征兵和较大规模的徭役征调；但它阻碍了农民私有经济的扩大，阻碍了农业的内部分工和工农业社会分工的发展。因此从唐高宗即位不久（七世纪中叶）逃户问题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当李白廿一岁的时候，朝廷中就对这一问题开始激烈地辩论（见下）。

不管封建地主上层如何阻止农民逃亡，逃户还是日渐增加，终于破坏了均田制。一般都以天宝战争为标志。这场战争开始于李白五十五岁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李白才逝世两个多月。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封建的大家族也日渐分解。玄宗竭力表扬张公艺几代同居，正说明这种现象逐渐稀少。大家族内部的私有财产发展起来；佃租制也逐渐发展。一些经济作物（如茶叶、水果、药材甚至花卉）的种植，以至农产加工（酿酒、酱醋等）、手工纺织业（当时不但农民自纺自织自用，而且有的田庄内部有上百张机织绫出售）的发展都是农村中新的现象并促进了大小城镇工商业的发达。

不过我们还要注意一点。由于上述情况，近代我国有些历史著述就把唐代说成商业社会，对许多历史现象都用所谓市民经济去解释。甚至个别著作还把李白描写为市民层的代言人。我们需要知道：当时较大的商人都是地主，民间的工艺制造在经济上比重很小。所以唐朝并不象十三、四世纪的佛罗伦斯、威尼斯、热诺亚等城邦有一个和地主并立的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市民阶层，和十七世纪的英国或十八世纪的法国当然更不能相比了。有的同志喜欢称唐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只在极其有限的比喻意义上是可取的。它们的社会内容具有原则上的区别。

我所以说这些，因为有的著作把李白描写为均田制的拥护者，而且认为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如上所述，李白在有些诗（如颂扬当地长官的诗）里确实歌颂过均田制。但那些诗大都含有应酬性质。处在当时制度下他自然不能不那样说。不管他是真心也好，应付也好，他那些话都没有多少进步内容。而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他整个一生都没有得到过均田制规定的对官僚的赏赐，同时他也不是按照均田制纳租服役的农民。

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意见。它倒不承认唐朝有所谓新兴的市民阶层，但是它认为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庶族地主阶层（也叫做寒族地主）；还有些自命博雅的教授如赵纪彬称之为非身分性地主，据说是根据列宁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里面的意见。他还说人家讲中、小地主是什么“史学界的教条”。

已故的陈寅恪教授首先提出世族与寒族的划分，并说世族重门阀、提倡经术，所以多从明经出身；寒族重文采，多从进士出身。他并以此来说明中唐的党争^⑥。而按之实际，则扞格难通。诚如岑仲勉教授所云：“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进士。”而“进士数目，大大供不应求”，“是知任何人执政，均无全用辞科或完全排斥非辞科之可能”^⑦，所以唐代党争中，双方都有由进士与非进士出身的。此其一。

其次，唐代土地可以买卖，非世族可以占有很多田产，而世族后裔不一定家境都很富饶；且三国以来朝政异常动荡，如南北朝，每个皇朝年代都很短。晋朝虽然较长，政变也很多。唐朝建立后也是如此。所以昔日世族沦为阜隶，昔日寒素骤登贵显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这种分别，用以说明一时社会风气还可参考；用以说明政治背景就无能为力了。

至于赵纪彬等，还把世族、寒族变成经济上阶层划分的根据，更是连中国中古并无贵族封地这一基本事实也置之不顾，硬

用欧洲制度解释中国历史，结果不免捉襟见肘了。

其实唐朝的党争，地域因素起很大作用，主要地不是不同阶层的斗争。唐朝初年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用人多出自关陇集团；对于山东（太行山以东，包括河南、山东等地，非今之山东省）世族有意抑制；对于江东的南朝旧族也是如此。由于各地势力的相互斗争，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只不过皇室主观的决策，而实际上对于山东世族也好，南朝旧族也好，都不能把他们完全排斥在政权之外。

同时，无论关陇内部或东部各地内部旧的世族没落和新的士族兴起都是极平常的现象，各派大地主都网罗了一批中、小地主为他们服务。后者有时候也提出一些自己独立的主张，但这种独立性是非常有限的。武则天时期猛烈打击关陇集团，而她所提拔的山东和南方的人物，仍然代表大地主。玄宗朝的宇文融本是北朝旧族，但他擢用的人物中不少中、小地主的代表。张说并非世族，他起自幽洛，却代表了东北部大地主阶层的利益，他本人也成为玄宗朝中最大的显贵。

李白家世和南方关系密切，和山东也颇有联系；但他和张说并不属于同一集团，且经常处于对立地位。这中间和他们分属于不同阶层倒有些关系，不过李白并未形成系统的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主张。他不过有时对大地主阶层采取一点批判态度而已。

至于明经和进士之分，与李白无关，所以此处从略。这里只说一点，由于商业、交通的发展，社会交际日益频繁。过去经学界那种训诂之学日渐冷落，逐渐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如象进士科考试时所谓策论，即是提出一些当时政治上存在的问题，让受试者著文阐明自己的见解。这种策论，后来考明经的也要作，不过数量比进士少一点。

南方和东部则上述训诂之学早就为玄学所排挤。当时的玄学，一为佛学，一为老庄之学。后来儒家的《周易》也受到它们的影响，更加玄学化，并变成道教的经典，与老、庄并称“三玄”。李白诞生前后刘知几著了一部《史通》。它主要不是考订事实，而是讲怎样写历史，反映一种新的社会政治观点。李白《远别离》诗中“或云‘尧幽囚，舜野死’”，这两件事的说法就出自这部书。可见经史之学都逐渐从注重训诂转而倾向义理。虽然学术观点不同，在方法上不能不说是受了玄学的影响。

研究的内容有了改变，同时文章的形式也有了改变。骈文和辞赋虽然仍然是进士考试的重要科目，但在社会交际中却使人们感到，它在表达上的束缚性很大。这种文体对表达一些比较复杂的意思比较困难，有时容易造成误会。所以那种散行的文章（到后来称为古文）和五、七言诗歌便流行起来。同时乐府诗歌和词曲也更加发展。

唐人的乐府诗是否入乐，到现在仍然是学术界尚待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李、杜的乐府诗至少一部份能歌，旗亭画壁的故事虽不一定可靠，但唐代歌妓之唱诗，薛用弱不能凭空捏造。由此可想见“乐府”一词，在唐尚非泛称。所谓词，以前一般认为起于中唐；近来任二北先生笺订《教坊记》，认为天宝年中即已流行，其说可信。同时他还校录了敦煌所得的大量“曲子”，认为是古乐府和词二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也可说是近年来我国研究唐代文学史的重要成果。

一般的五七言诗里也出现了寒山、王梵志一类宗教徒所写的劝诫诗；虽然艺术价值不高，但在明白如话这一点说却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在最初，这些都只是写作中自发的趋势，到后来逐渐也反映到文学理论中。这就是有名的“文学复古运动”。早在五世纪刘

總著《文心雕龙》，虽然也大讲“声律”、“丽辞”之类，认为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但是他把传统的文学理论和佛学结合在一起（他的佛学本身已包含了许多庄子思想的成分），认为：“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他在书里明确地提出文要表现“自然之道”。所以唐朝继承六朝传统的诗人，李白之前如刘希夷、张若虚，之后如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等，虽然一方面保持六朝的风格，一方面为了适应唐代的风气，在风格上也不能不有所改变。他们都不属于复古派。

和刘知几同时的陈子昂，一方面写《感遇》诗，一洗六朝藻饰之风；一方面提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可以说在诗歌方面开文学复古的先河。我们在李白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上都可以见到陈子昂对他的影响。这一点所有研究的学者差不多都曾指出。

和李白同时的萧颖士、李华，比他稍年青一些的如元结、独孤及，都是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人物。李白最早的墓志便是李华写的。独孤及曾与李白交游，有《送李白之曹南序》，今存。那时李白五十来岁，独孤及二十多岁。李白同时的诗人王维、杜甫等，虽无理论传世，他们诗歌的作风也反映了这种复古潮流。这种复古的主张，虽然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本身还不能彻底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不能在传统文学思想之外独立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也为了从历史上为自己的主张找根据，以加强其说服力。他们的重点：改革多于复古。

但他们对古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其后的韩柳元白，因为与本题无关，可以不讲。即以李白和杜甫而论，反映在文学中的他们的政治理想，也有向往远古的倾向；杜甫所谓的古是“窃比稷与契”，而李白所谓的古却是“羲皇以上”。

这里我们不妨脱离开这些理论主张，考察一下当时诗歌的

创作实际。

陈子昂所谓“汉魏风骨”，在他的前辈诗人王勃、杨炯的作品中已经略见端倪。今以王勃那首众所周知的《送杜少府之秦川》为例。诗云：

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和陈子昂同时的郭震也有这种倾向。

李白年青时，朝廷宰相张说和苏颋被认为最大的文学家，号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他们擅长写典谟训诰之文，也擅长写应制诗。但是在朋友酬赠之中，也不能不趋向当时风气，写一点新的腔调。

张说曾经贬谪岳阳。后人说他：“晚谪岳阳，诗益凄惋。人谓得江山之助。”这里略举数首，不尽是凄惋之作，以见这种新的风气：

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
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

——《被使在蜀》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蜀道后期》

旧馆分江日，凄然望落晖。
相逢传旅食，临别换征衣。
昔别山川是，今伤人代非。
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

——《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

李白一生交游，在政治上大多与张说对立^⑧；但是他的诗

歌，有时也受到张说的影响。如张说《岳州作》：“山川临洞穴；风日望长沙”；李白《秋浦歌》（其六）就说：“山川如剡县；风日似长沙”。又如他有名的七绝《望天门山》里面说：“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虽较张说《和尹从事悉泛洞庭》里的“忽惊水上光华满，疑是乘舟到日边”更为精炼，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受了后者的影响。

苏颋的诗，如《蜀城哭台州乐安少府》的末段：

天路本悬绝，江波复沍洄。
念孤心易断，追往恨艰裁。
不遂卿将伯，孰云陈与雷。
吾衰亦如此，夫子复何哀！

再举一首全篇的。如歌词《长相思》：

杨柳青青宛地垂，桃红李白花参差。
花参差，柳堪结，此时忆君心断绝。

苏颋曾为益州长史。李白谒见过他；而且他对李白的作品曾加以评论，对他的创作当然有过影响。

上述那位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有一首诗：《读汉书作》，和李白的诗惊人地相似。诗云：

汉王有天下，歟起布衣中。
奋飞出草泽，啸咤驭群雄。
淮阴既附凤，黥彭亦攀龙。
一朝逢运会，南面皆王公。
鱼得自忘筌，鸟尽亦藏弓。
咄嗟罹鼎俎，赤族无遗踪。
智哉张子房，处世独为工。
功成薄受赏，高举追赤松。
智止信无辱，身安道亦隆。
悠悠千载后，击枹仰遗风⑨。